

南大商学评论

Nanjing Business Review

全球化背景下对库兹涅茨“倒U假说”之质疑

王培暄

基于微观风险补偿的公司债收益率影响因素分析

蒋 彧 高 瑜

背景因素对中国居民家庭过度负债影响的实证研究

陈 莹 武志伟

博弈计量经济学：基于近期研究的回顾

Patrick Bajari 洪 瀚 Denis Nekipelov

译者：周 末 由昭政 谢心怡 鲁 惜

市场竞争程度、组织结构与业绩评价

苏文兵 熊焰韧

我国应对碳关税征收的策略选择及筛选检验

——基于AHP层次分析法

胡 靖 晏子初

国外英文学术期刊有关产品伤害危机研究回顾

任金中 景奉杰

CF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黄志忠 朱 琳 张文甲

29

2015-12(1)



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系列

南大商学评论

Nanjing Business Review

29



南京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大商学评论. 第29辑 / 刘志彪主编.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305-15559-8

I. ①南…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经济—文集 IV.
①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5341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南大商学评论(第 29 辑)
主 编 刘志彪
执行主编 郑江淮 贾良定
责任编辑 张倩倩 王抗战 编辑热线 025-8359699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人文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 字数 260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5559-8
定 价 32.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主办单位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中心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南京大学商学院

《南大商学评论》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范从来

主 编 刘志彪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津平 马野青 王全胜 王跃堂

安同良 刘志彪 刘 洪 刘春林

张正堂 陈传明 沈坤荣 杨 忠

杨雄胜 范从来 郑江淮 洪银兴

赵曙明 徐志坚 贾良定 葛 扬

韩顺平 裴 平

执行主编 郑江淮 贾良定

执行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宇 王 兵 皮建才 曲兆鹏

刘德溯 李 剑 张 骁 张 晔

何 健 杨 雪 郑东雅 俞 欣

姜 嫻 徐小林 黄韞慧 韩 剑

蒋春燕 蒋 彧

主编的话

《南大商学评论》是由南京大学商学院主办的经济学、管理学类非连续的学术出版物。创办以来,以其规范、严密、扎实的研究风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2012年被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评入 CSSCI 来源刊物。在此我向关心、支持本文集的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一轮的全球化期待中国学术研究像中国经济一样,进入世界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和前沿。为了鼓励源自中国的原创性研究,《南大商学评论》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实践,提倡从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中发现问题、提炼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本文集将延续以前的传统,广泛接受来自国内外学者的自由投稿,采用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主要发表原创性的规范和实证研究的学术论文,以及案例、综述和评论性的文章。研究领域不限,欢迎从宏观经济学、财政金融、产业组织、国际贸易、比较经济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电子商务、会计等相关具体领域进行专门化研究的成果。

欢迎赐稿,谢谢!



目录

-
- 1** 全球化背景下对库兹涅茨“倒 U 假说”之质疑
王培喧
-
- 20** 中国要素市场错配与地区经济增长绩效
——基于垄断竞争模型的实证研究
李金星
-
- 39** 基于微观风险补偿的公司债收益率影响因素分析
蒋 彧 高 瑜
-
- 55** 背景因素对中国居民家庭过度负债影响的实证研究
陈 莹 武志伟
-
- 73** 博弈计量经济学: 基于近期研究的回顾
Patrick Bajari 洪瀚 Denis Nekipelov
译者: 周末 由昭政 谢心怡 鲁惜
-

112 市场竞争程度、组织结构与业绩评价

苏文兵 熊焰初

130 我国应对碳关税征收的策略选择及筛选检验
——基于 AHP 层次分析法

胡 靖 晏子初

144 国外英文学术期刊有关产品伤害危机研究回顾

任金中 景奉杰

168 CFO 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黄志忠 朱 琳 张文甲

183 社会交换视角下的变革型领导研究：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陈永霞

CONTENTS

- 1** The Query of Kuznets' "Inverted U Hypothesi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Peixuan Wang

- 20** Factor Distor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Monopoly Competition Model

Jinxing Li

- 39** Study on Affect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Bond's Yield Based on Microscopic Risks

Yu Jiang Yu Gao

- 55** The Impacts of Background on Household'Over-indebtedness Debt: An Empirical Study in China

Ying Chen Zhiwei Wu

- 73** Game Theory and Econometrics: A Survey of Some Recent Research

**Patrick Bajari Han Hong Denis Nekipelov
Mo Zhou Zhaozheng You Xinyi Xie Xi Lu**

-
- 112** The Market Competi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enbing Su Yanren Xiong

-
- 130** Strategy Selection and Screening Test of the Answer
to Carbon Tariffs

—Based on the AHP Analysis

Jing Hu Zichu Yan

-
- 144** Product Harm Crises 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of Papers in Foreign English Academic Journals

Jinzhong Ren Fengjie Jing

-
- 168** CFO Compens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Zhizhong Huang Lin Zhu Wenjia Zhang

-
- 183** A Social-exchang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Yongxia Chen

全球化背景下对库兹涅茨 “倒 U 假说”之质疑^①

王培暄*

【摘要】“库兹涅茨假说”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整个长期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是按照一种“先上升后下降”“先恶化后改善”的“倒 U 型”轨迹进行的，该变动轨迹主要受经济增长这个单一变量的影响。库兹涅茨的“倒 U 假说”以及早期研究者们对其所做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大都是依靠英、美、荷、德等现代化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具体数据，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内源内生”型道路。然而，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却是一种迥异于前者的“外源外生”型道路。本文截取了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我国的数据资料，并利用统计模型对其进行了图表分析和回归分析。实证检测的结果是：对于我国来说，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来自发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坐等库兹涅茨“倒 U 曲线”之“拐点”的到来的做法，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危险的，这很可能使我国像一些拉美国家一样，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严重分化的恶果，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倒 U 假说” 全球化 非均衡型经济 外向型经济 “拉美陷阱”

【JEL 分类】 O15 O38

① 此项研究是 2011 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省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社会风险预警与控制研究》（批准号：11SHB003）和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与国家政治稳定的政策路径研究》（批准号：13BZZ001）的阶段性成果。

* 王培暄（1968—），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应用社会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收入分配改革及社会风险预警控制。E-mail: jzwang@nju.edu.cn。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5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根据英、美、德等国家的历史数据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整个长期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趋势,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轨迹进行的,这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库兹涅茨还指出:这种“倒U型”轨迹不仅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过,而且可能也会出现在一些“年轻”(younger)国家。^[1]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

按照库兹涅茨给出的解释,在经济发展初期,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增长是储蓄与积累的函数,而储蓄与积累主要来自富裕阶层,因此,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向富裕阶层倾斜是历史的必然。第二,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早期,往往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要大于农村内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批农村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这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小的人口规模在逐渐缩小,而收入分配差距大的人口规模在逐渐增大,从而将导致人口总体收入差距的拉大。

然而,当收入差距过大时,又会有其他因素来抑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一系列旨在抑制高收入阶层收入过快增长和低收入阶层收入过分降低的法律和政策开始出台。第二,由于富裕阶层更倾向于节制生育,因而经过若干年后,将有固定比重的较低收入人口进入富裕阶层,从而使富裕阶层的收入份额减少,这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第三,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技术创新创造出许多新兴行业,新兴行业的出现将使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渐渐变成高收入人群甚至是富裕阶层,使来源于旧行业的财产和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降低,从而改善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

总之,按照库兹涅茨本人的分析,经济增长是影响收入差距变动趋势的主导因素,法律政策因素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很小。而且,在经济发展的前半段,即收入差距扩大阶段,法律政策完全不起作用;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即收入差距缩小阶段,法律政策才开始作为一个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变化产生影响。

库兹涅茨“倒U假说”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即,如果收入差距扩大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政府和社会试图缩小该趋势的努力也

许就是徒劳无功了。因而,该假说一经提出,便很快成为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核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都一致地支持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量利用横截面跨国资料的实证研究发现,库兹涅茨“倒U曲线”并没有在一些国家呈现出来。

本文认为出现以上差异的原因在于库兹涅茨假说本身忽略了“全球化”这一因素。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以及早期研究者们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大都是依靠英、美、荷、德等现代化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具体数据;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内源内生”型道路。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研究都在关注现代化后发国家的实际情况,并较多地使用了这些国家的经验数据,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却是一种“外源外生”型道路。

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的这种特殊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这些国家必然具有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对收入分配的特殊影响机制:其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国际政治的烙印,而不是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回流效应”的结果;而其收入差距的缩小却很难达到理论预期中的由“回流效应”向“扩散效应”转变的“拐点”。总之,丧失了库兹涅茨“倒U假说”得以成立的条件,使得这些国家不能像先发国家那样呈现出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

二 文献综述

对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研究首先表现为理论解释。其中,刘易斯和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库兹涅茨“倒U假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开始经济发展时面临的是一种二元经济: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很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城市中的现代工业部门,这个部门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接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部门。而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二元经济的一元化过程,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逐步实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时由于两个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相差很大,使得部门间的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工业部门转移,这种收入差距在经历扩大后会逐渐减少,最终达到部门间的生产率和收入的平衡。^[2]另外,罗宾逊借鉴两部门模型,利用对数方差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也证明了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存在,并将其称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条必然的规律。^[3]

还有,冈纳·缪尔达尔的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也为库兹涅茨假说做出了

正面解释。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指出,地区不平衡发展是各国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而地区收入差距也是构成整体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缪尔达尔将其称为“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和“扩散效应”(diffusion effect)。前者指发达地区同落后地区争市场、资本和人才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起消极作用,导致差距扩大;后者则指发达地区对原材料及初级产品的需求和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以及通过资本、人员流动带来的技术扩散等因素从而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导致差距缩小;二者作用的强弱决定收入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一般来说,在发展初期,由于发达地区有较高的资本报酬率,能提供更高的工资和发展机会,使得落后地区的资本和高素质人才大量流失到发达地区,回流效应处于主导地位,收入差距会不断扩大。而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诸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等现象,同时,由于落后地区在政策等方面的仿效,使得资本、人才倒流,此时扩散效应处于主导地位,收入差距将缩小。因此,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二者作用强弱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导致收入差距的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4]

除理论解释外,更有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对“倒 U 假说”的实证检验上。实证检验的数据资料一般分为时间序列资料和横截面跨国资料两种。一些研究者利用各国的时间序列资料对“倒 U 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利用英国和美国长期的历史资料对库兹涅茨“倒 U 假说”进行检验,其研究结果支持了“倒 U 假说”。研究发现:英国收入分配恶化的态势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得到改善,而美国则发生在 20 世纪初期。索洛(Solo, 1960)等人对英、荷、德等国的研究也均证实了库兹涅茨的假设。^[5]

由于收到资料可得性的限制,更多的实证研究则是利用横截面的跨国资料(即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来对库兹涅茨“倒 U 假说”进行检验。如阿德尔曼和毛瑞斯(Adelman & Morris, 1971)用 43 个国家数据、鲍克尔特(Paukert, 1973)将阿德尔曼等人的数据扩展到 56 个国家、阿鲁瓦利亚(Ahluwalia, 1976)用 60 个国家的样本资料、钱纳里和塞尔昆(Chenery & Syrquin, 1975)等人利用 55 个国家的资料验证了库兹涅茨假说。他们通过比较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基尼系数,证明了“倒 U 曲线”确实存在。^[6]其中,阿鲁瓦利亚(Ahluwalia)使用了 60 个国家的样本(其中发达国家 14 个,发展中国家 40 个,社会主义国家 6 个),对库兹涅茨假说进行了验证,分析结果与库兹涅茨假说中的预测是完全一致的。^[7]

以上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都出奇一致地支持库兹涅茨的“倒 U 假说”,然而,所有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利用横截面跨国资料的实证研究发现,库兹涅茨“倒 U 曲线”并没有在一些国家呈现出来。如阿那德和坎布尔(Ananad & Kanbur, 1993)^[8]、菲尔德和杰克布森(Fields &

Jakubson, 1994)、德宁格和斯奎勒(Deininger & Squire, 1996)、霍斯坦奈特(Hestonnetal, 2002)、陈少华和拉瓦林(Chen & Ravallion, 2004)等^[9]所进行的横截面跨国数据分析并没有支持库兹涅茨的“倒 U 假说”。

其中,德宁格和斯奎勒(Deininger & Squire)的研究使用了跨国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数据的好处是可以在模型估计中识别出国别特征的影响作用。德宁格和斯奎勒的研究发现:对不同的样本国家来说,绝大多数国家(大约 80%)的估计结果显示,其收入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是不显著的,还有一些国家的收入变量具有显著的系数估计值,但是其符号与库兹涅茨假说预期却相反,只有 10%的样本国家的估计结果支持了库茨涅兹假说。他们同时指出,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得出有利于库兹涅茨假说的结论,一个主要原因是受到拉美国家数据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国际上属于中等水平,而它们的收入差距却是最大的,如果将这些国家样本删除以后,支持库兹涅茨假说的估计结果也就不存在了。^[10]

另外,陈少华和拉瓦林(Chen & Ravallion)则利用 67 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数据对库兹涅茨假说进行了验证,其中的 42 个国家具有两个以上年度的数据。通过对这些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收入(消费支出)差距的变化幅度与收入(消费支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他们发现,虽然就全部样本而言,消费水平的上升与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具有相关性;但是,如果将东欧和中亚国家的样本删除以后,即在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范围内,消费水平与分配不平等之间不具有任何显著的关系。^[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国内的很多学者也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利用实证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 30 余年来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研究的结果对于我国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倒 U 曲线”,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变化也遵循库兹涅茨“倒 U 曲线”,如樊纲在《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中得到的结论是趋于相关;周云波(2010)则预言: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化,在不远的将来将会迎来“倒 U 轨迹”的拐点,时间很可能在 2015 年前后。^[12]有学者对我国收入差距变化是否遵循“倒 U 曲线”不能肯定,如邹恒甫在《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中得到的结论是:收入分配差距与人均 GDP 呈现弱相关关系。^[13]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变化不遵循库兹涅茨“倒 U 曲线”,如宋宏远、马永良(2005)认为,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始终存在,且呈现波动扩大的趋势;许冰、章上峰(2010)的研究发现,中国近 30 年来的收入差距变化呈现多拐点特征;王振中反对库兹涅茨“倒 U 假说”,理由在于,后来的学者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等等。^[14]

三 “全球化”背景下库兹涅茨“倒 U 假说”条件之丧失

为什么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量的横截面跨国数据资料并不支持库兹涅茨的“倒 U 曲线”呢? 本文认为是由于库兹涅茨假说本身忽略了“全球化”这一因素。

库兹涅茨的“倒 U 假说”以及早期研究者们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大都是依靠英、美、荷、德等现代化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具体数据; 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内源内生”型道路。这种道路的特点是: 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来徐徐推动的内部创新, 这是一个缓慢渐进的社会变革过程。同时, 由于外来因素的影响始终居于次要的地位, 这又是一种自发自主的社会变革过程。

但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大量的研究都在关注现代化后发国家的实际情况, 并较多地使用了这些国家的经验数据, 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却是一种“外源外生”型道路。这种道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下强烈感受到外来异质文明的冲击而开始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注定了后发国家的这种外源外生型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就明显地具有“赶超型”的特点。在经济十分落后而发展所需资源又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后发国家必须通过对各种要素的非均衡性配置手段来迅速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 也就是说, 这是一种非均衡型经济。另外, 后发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机遇, 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 迅速提升其在水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也就是说, 这是一种外向型经济。这种非均衡型加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决定了这些国家必然具有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对收入分配的特殊影响机制, 因而丧失了库兹涅茨“倒 U 假说”得以成立的条件, 使得这些国家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呈现出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的“倒 U 型”曲线。

首先, 从非均衡型经济的层面上看, 后发国家为了能够在经济上迅速赶上发达国家, 都选择了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模式, 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这些国家必须以大量的生产资料、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后发国家又都处于一穷二白、基础薄弱的境况中, 这样就必须对有限的经济要素进行非均衡性的配置。例如, 为了鼓励投资, 必然使资金占有者在分配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其获得的收入大大地高于劳动者的收入, 也就是“富者越来越富, 穷者越来越穷”, 扩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 必然会优先发展沿海地区, 扩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 必然会忽视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及人力资本的投入, 扩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东欧等国发生变革以后, “私有化、自由贸易、完全市场调节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唯一可行的发展战略”的观点一时成为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的共同看法, 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华

盛顿共识”是与当时西方国家所倡导的自由放任思潮相一致的,这一思潮认为,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政府都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内在法则,只有市场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行之有效的灵丹妙药。^[15]“华盛顿共识”和自由放任思潮更是对后发国家的非均衡型经济发展战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后发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国际政治的烙印,而不是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回流效应”的结果,而这种收入差距扩大自然就很难像早期发达国家那样呈现出“倒 U 型”曲线那样缓慢渐进的发展趋势。

以拉美国家为例,20 世纪 30 至 80 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原本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工业,重点和优先发展以加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到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均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达到较高水平,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同时,这些国家的人均 GDP 也都超过了 3 000 美元,^[16]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随着对进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一些国家走上了举债发展的道路,至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1985 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具有明显新自由主义色彩的“贝克计划”,90 年代初又强行推销“华盛顿共识”。^[17]自此,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便出现了严重的误区:非均衡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其政府职能受到很大削弱,经济调控能力急剧下降,以致宏观政策缺乏均衡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忽视公平发展和财富分配,虽经过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运动”的努力,却仍然难以摆脱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过大的局面。例如,阿根廷的私有化几乎把整个国家都出售一空;巴西不仅卖掉了亏损企业,连那些原本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企业也被卖掉。^[18]随着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比重急剧下降,其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力也随之降低。而随着一些民族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也日益突出,造成了大批的城市贫困人口。据统计,墨西哥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口达到 1 470 万人,约占城市总人口的 20%,政府无力向贫民窟提供水、电等基础设施,长期采取放任不管政策,居民用水要靠自我组织起来建小型的水塔、水泵或盗用城市供水系统的水,用电则从附近的输电站偷电;贫民窟的子女也很难接受较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根据当地人介绍,贫民窟里每 100 个上小学的人中只有 40 个能升入初级中学,其中 20 人能上到高中,只有 1 个人能进入大学。而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和农村则更加贫困落后,据美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拉美国家贫困人口的总数已达到 2.27 亿,占拉美国家总人口的 44%,其中赤贫人口达 1 亿。^[19]

其次,从外向型经济的层面上看,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它们日益被纳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这虽然可以加快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也会因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而被牢牢地锁定。发展中国家在建立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后,其经济结构就